

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若干問題

徐復觀

今歲暑假中，寫成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問題一文，刊於東方雜誌復刊五期六期。在此文第一節裡提到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新材料，然未及深加研究；故對石濤給八大山人書札求畫大滌草堂圖一事，立論亦嫌草率。環繞此一書札的有關問題，對石濤乃至八大山人生平之了解，以及對石濤畫蹟真偽之辨別，至為重要，乃補寫此文。

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誌。

一、石濤晚年為道士

我在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問題的長文中，曾提出石濤向八大山人求畫大滌草堂圖的書札，現在發現了三通。一通是日人橋本關雪在上海清道人家所見（後簡稱「橋本本」）。一通是日人永原織治所藏（後簡稱「永原本」），現影印在圭文館發行的石濤八大山人畫集裡面（附影印片一）。另一通是張大千先生所藏（後簡稱「大風堂本」），影印在大風堂名蹟第二集裡面（附影印片二）。橋本本是以日文譯出，刊於其石濤一書中。傳抱石石濤上人年譜係由橋本本再以中文譯出。此三通書札的異同真偽，留在後面再談。這裡只先指出，在三通書札中，都有「莫書和尚，濟有髮有冠之人」的話。橋本關雪因為他在上海清道人家首先看見了一通，所以在他所著的石濤一書中，便特標明「石濤非剃髮僧」。但陳鼎的瞿尊者傳有「國亡即薙髮為比丘」的話；蕭伯玉春浮園詩集庚寅（順治七年，時石濤二十一歲）鄧湖望匡廬退尋舊遊次而記之以詩的詩中有「石僧復招我，來作水口緣」的話；次年辛卯（順治八年）春，石濤奉蕭伯玉書往常熟致錢牧齋（按蕭伯玉即死於是年四月十三日），牧齋送石濤絕句十四首中有「五老棲賢應有喜，昆明劫外一僧歸」的話；同時，丁酉春（順治十四年，時石濤二十八歲），丁元公為石濤造像，僧服無髮，道貌岸然。把上面的材料合起來，則石濤於明亡後，實係剃髮為僧，並非假僧之名以自飾，是不容推翻的事實。然則「濟有髮有冠之人」，指的是什麼？並且當石濤寫此書札時，清朝早不容許留明代之髮，不許戴明代之冠；石濤此時而有髮有冠，豈非成為有滿清之髮，有滿洲之冠？我偶在鄧之誠著清詩紀事初編卷五發現了下面的材料，才知道石濤的所謂有髮有冠，指的是他由僧入道而言。有髮，是有道士之髮，有冠是有道士之冠。而「大滌」正是他改為道士後的特有名稱。清詩紀事初編卷五陶蔚（原注：鬢鬢一卷）條下：

「陶蔚，號卷翁，寶應人，澂子。少從葉燮讀書於橫山……又學畫於石濤，有贈大滌老人詩。自注：『即苦瓜也。忽蓄髮為黃冠，題其堂曰大滌，同人遂以此呼之。』然則大滌子乃道士之稱，今與苦瓜混而為一，誤矣！」

我沒有找到鬢鬢集；但鄧氏上面的材料是由親見而來；因為他從鬢鬢集中錄出了八首

詩。所以此一材料，是絕對可信的。姜實節於甲申（康熙四十三年，石濤七十五歲）夏杪，題石濤膽瓶拳石蘭梅五絕句中的第二首是「白首黃冠淚欲枯，畫成花竹影模糊。湘江萬里無歸路，應向春風泣鷓鴣」。（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二）按李玉棻歐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一「姜實節，字學在，號鶴澗，山東萊陽人，姜塚子；以孝義著；工山水。著焚如草……。」姜塚據明史本傳，他是崇禎四年進士，卒於康熙十二年，年六十七。以建言廷杖下獄，戍宣城衛。自稱「敬亭山人」、「宣州老兵」。臨終遺命葬宣州，以無故君赦命之故。其家卜居吳門。長子留宣城守墓，實節為其次子。以姜塚的年齡推之，姜實節的年齡，應與石濤不太相先後。且姜氏一門忠孝；姜塚遣戍宣城，宣城又為石濤平生來往經過，並曾多次居留之地。而蔣恭棨的孝正姜先生寓節（按寓節乃姜塚弟姜塚之子）傳稱「貞毅（姜塚）卒葬戍所，長子留守墓，獨仲子（按即實節）與先生（按即寓節）家於吳，友愛甚至……其所常與往來，類遺民宿學，遁世高尚之士。」（碑傳集一百二十六）。則實節與石濤當相知有素，故其五絕句獨能道出石濤心事；而「白髮黃冠，」又可作石濤晚年為道士之確證。

二、三通書札的異同

因為石濤在給八大山人的書札上，正式宣佈他是有髮有冠之人；所以要判斷石濤棄僧為道士的原因及其大概時間，還得從此書札上著手。

石濤給八大山人的書札，在今日可以看到的三通中，先不推論誰真誰假，只考查彼此間在有關鍵地方的異同。今以大風堂本為底本，對勘如下：

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橋本本及永原本無「花甲」二字，又永原本作「年逾七十」。登山如飛永原本「登」字上有「而」字。真神仙中人橋本本「人」

字下多一「也」字。濟將六十六永原本作「濟生諸事不堪上面數句，永原本在「屢接先生十年已來，見往來者所」一段之後。

得書畫永原本「所」字作「新」字。皆非濟輩可能讚誦得之寶物也橋本本此數句因文字上之出入而語意不甚明瞭，殆因一譯再譯之故。濟幾次

屢接先生手教，皆未得橋本本無「皆」字，「得」字作「及」字。永原本無「得」字。奉答，總因病苦，拙於酬應，不獨先

生一人橋本本及永原本「獨」字下有「於」字。又「四方皆知濟」是此等病橋本本少「是」字及「等」字。橋本本在「人」字下多「為然也」三字。

無「是」字。真是笑話人橋本本無此句，永原本無「真」字，今因橋本本及永原本皆作「日」字。李松庵兄還南州，空函寄

上，濟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濶小幅永原本此句作「濟欲求先生堂畫一軸」。平坡上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株，

閣中一老叟永原本此句作「閣中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草堂也永原本此句無「大滌子」三字。此事少不得

者橋本本此句作「若事不多」，按或係誤譯。餘紙求法書數行列於上橋本本及永原本皆無「列於上」三字。真濟寶物也橋本本「濟」字下多一「之」字，又在此

句下有原注謂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橋本本及永原本皆無此二句。款求書大滌子大滌草堂橋本本無此句。莫本

本作「書和尚，濟有髮有冠之人橋本本「人」下有「也」字，又此句下有原注「數字不明」。向上一齊滌橋本本無此句。只不能還身

至西江橋本本此句作「只恨身不能退至西江」。一睹先生顏色為恨橋本本無「為恨」二字。老病在身，如何如何永原本少下「如何」兩字，但多

「不宣」雪翁先生 濟頓橋本本無此二字。

這裡先得說明三點：

- (一)橋本氏在清道人家所見本，經日譯後，又由傅抱石氏中譯，故其字句間之小小異同，可解釋為由重譯而來，不必以文字異同論。
- (二)從文字前後之順序，及信中所述八大山人與石濤本人之年齡，並提出畫幅尺寸大小等三大關鍵處言之，橋本本與大風堂本完全相同，而與永原本完全不相同；所以可以說，橋本本與大風堂本最為接近。但這兩本決非是一個本子。因為大風堂本不僅沒有橋本本中兩處注明「數字不明」的情形，而且憑空多出「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二句。加之，在許多字句方面，大風堂本又反與永原本接近。所以文字又較橋本本為順暢。
- (三)目前所看到的三種不同本子，因為在基本內容上是相同的，所以不能解釋為這是石濤前後所寫的通書札。這三通書札的關係，必然是一真兩偽，或三者都偽的關係。

三、由石濤及八大山人的生年、行跡、推斷三通書札的真偽

我在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問題的文章中，曾從書法方面，斷定永原本為必偽（註）。又從「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兩句話，斷定大風堂本十之八九是偽。橋本本只見譯文，不敢斷定，內心却以為是真的可能性較大。現在重新考慮此一問題時，覺得對永原本的斷定，有些近於輕率，所以從另一角度來重加考查。

石濤晚年棄僧為道士一事，過去研究石濤的人很少知道；所以「莫書和尚，濟有髮有冠之人」二句，為上述三種書札中所同有，這說明此二句確是石濤自己的話；因而石濤通書八大求畫的事，是可以相信的。同時，石濤在寫此書札時，已經由僧人變成道士，也是無可懷疑的。石濤的年齡，由他康熙己卯重午七十生日的詩，而推定他出生於崇禎三年，這是沒有其他證據可以推翻的。依照橋本本及大風堂本，石濤寫此信時是「濟將六十」，所以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以後簡稱傅譜）便將此事繫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石濤五十九歲的下面，是年石濤由宣城還揚州。次年是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石濤六十歲，春天在揚州平山道上重見康熙，他的紀事詩中有句謂「那能音吼說真傳」，可見他此時是和尙的身份。是年他離揚州北上；此行是先到西安，再由西安赴北京？還是直接由揚州赴北京？我在目前還不敢斷定。但他留別金陵諸友的古詩中，歷叙他投入旅庵和尙門下的因緣，及留住宣城敬亭黃孽禪師道場十餘載，和在南京寄住勒上人處等行跡，可知此時他的精神是完全沈浸在和尙生活裡面。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石濤六十四歲，是年秋他買舟沿運河返揚州；應當算是他的邀請者及居停主人的博爾都（問亭）的送苦瓜和尙南還詩中有「飛錫竟何之」的句子，可見此時他還是和尙的身份。同時，從五十九到六十四、五歲，正是他一生向外活躍的時間，恐怕不易想到改變身份的問題。而由五十九歲到六十五、六歲之間，就傅譜所錄的畫跡款識來看，並無大滌堂或大滌子字樣。由此可以斷定石濤在年將六十時不可能是有髮有冠之人。也由此可見橋本本及大風堂本，全是捕風駕空之物。而大風堂本是看到橋本本的譯文及永原本以後，參合兩者所偽造出來的。

永原本「濟生六十四、五」，即是石濤寫此信時是六十四、五歲，因而他棄僧入道，也是六十四、五歲。依照中國人一般的習慣，說「六十四、五」，實際上是滿六十四歲，進六十五歲。所以寫這封信的時間應當是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的年尾，或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的年初。這正是北遊歸來以後，生活由向外飛躍而重歸向內凝定的轉捩點；此時改變身份，在事實上，

應當是相當恰切的。

再從八大山人的年齡方面來考察此一問題吧。在橋本本及大風堂本說「濟將六十」，而八大山人的年齡是「七十四、五」，由此一說法來推算，八大山人應當年長於石濼十五、六歲。在永原本，則石濼「六十四、五」，而八大山人是「年逾七十」，假定年逾七十可以估計為七十一、二歲，則八大山人只年長於石濼六、七歲；這兩種不同的年差，應當以何者為近於事實呢？首先我得指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提出過可以判斷八大山人生卒年月的可靠資料。日本求龍堂所發行的徐文長、石濼、趙之謙畫冊一一一頁的以石濼為中心的當時主要人物表裡面，斷定八大山人長石濼十歲，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關於八大山人較詳的傳記，有陳鼎留溪外傳中的八大山人傳及邵長蘅青門旅稿中的八大山人傳。兩傳內容頗多出入；而邵長蘅於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至庚午（康熙二十九年）年間，客居南昌（參閱青門旅稿自序及族兄靜山提學哀辭）時，曾由澹公和尚之介，在澹公所居寺中與八大山人相見，並同宿寺中。八大山人出生於南昌；在四十左右以後，沒有離開過南昌，又與澹公和尚相契；所以邵長蘅在南昌的一年中，也可以得到許多有關八大山人的可靠的口頭材料；因此，邵傳遠較陳傳為可信。邵氏在南昌的己巳，石濼是六十歲。在南昌的庚午，石濼是六十一歲。若依橋本本及大風堂本推之，則八大山人此時為七十六、七歲。由永原本推之，則八大山人此時為六十六、七歲。據邵傳述兩人相見的情形是「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驚喜，趣呼筇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就常情推測，年紀到了七十六、七歲，冒大風雨侵早至北蘭寺踐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從此一故事上來推測八大山人的年齡，也以永原本為近於真實。邵傳稱八大山人「弱冠遭變」；崇禎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的國變（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殉國），石濼十五歲。若八大山人長石濼六、七歲，則此時為二十一、二歲，故邵長蘅可稱之為「弱冠」。若如橋本本及大風堂本所稱之八大年歲，則甲申國變時，八大已年逾三十，邵氏不能稱之為「弱冠」。因此，我在這裡順便推測八大山人之生年，應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庚午（石濼生年）前之六、七年之天啓九年或十年（一六二四或一六二五），大概不會太遠於事實。由此所得的石濼與八大年齡的距差，自然也以永原本所說的為近於真實。

註：我留心此一問題時，曾特向彭醇士、陳定山兩先生請教過。我的此種斷定，多少受了陳先生的一點影響；因為他在這一方面是很有造詣的。

四、石濼棄僧入道的原因（一）——石濼僧系的政治背景

現在對於石濼棄僧入道的原因，希望能作點合理的推測：

先祖望結埼亭集十一黃梨洲神道碑有謂：「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按即僧徒之意）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為異姓之臣，反甘為異姓之子也。」陳垣清初僧爭記卷三對此謂「嗣法上堂，僧伽本色，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言之矣（註）。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皇帝）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為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頁六十八——六十九）按禪宗青原，南嶽兩系，有一共同特點，即是遠離政治，僻處山林。所以百丈懷海初創叢林，建立清規時，決無

祝聖祝釐之事。陳垣謂「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僧諍記卷三頁六十九）其意謂此事殆始於宋代。然今日可以看到之清規，蓋出於元代之修改；元代僧道之爭甚烈；全真教既以丘長春而得勢，僧徒必援政治勢力以相抗衡。故祝釐祝聖，以出於元代修改之可能性為最大。木陳忞將其上推於百丈，可謂誣祖。我之引用這段材料，意在指出遁跡僧伽，並非不臣異姓之妥善辦法，尤以開堂說法，為戾其原來宗旨。邵傳謂八大「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為僧。不數年，暨稱稱宗師，住山二十年……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旦夕，裂其浮屠服焚之。」「初為僧號雪箇，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按由此可知張庚國朝畫徵錄謂「甲申後號八大山人」為妄說，「甲申」後乃為僧耳）。此時八大應當已過了四十歲。八大之出此，可能和僧徒上堂之祝聖有關。石濤的一旦棄僧服如敝屣，也可能有此一廣汎之背景。八大還俗而欲不為滿清之冠髮所污，只有佯狂裝啞。而石濤在當時的社會關係，遠較八大為複雜，所以只好當道士。

但就石濤來說，我以為還有其個人的特別原因。

石濤有一個印章是「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孫，原濟之章」。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石濤出家為僧的僧家世系。天童忞即是木陳道忞；依慣例，稱為木陳忞；他是天童密雲圓悟的有力法嗣之一。善果月則係木陳忞的重要弟子。石濤把這一世系刻成印章，可見他當時是以此一世系而自豪的。

天童圓悟，是明代中葉後臨濟宗的重鎮。他門下有名的法嗣，除木陳道忞外，還有漢月法藏、破山海明、費隱通容、石奇通雲、牧雲通門、林野通奇等，其中以漢月藏及木陳忞的影響最大。木陳忞在順治十年癸巳，將同人含有故國之思，興亡之感的詩文，集為新蒲綠，蓋取杜甫哀江頭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之意，一時傳誦。婁東十子詩選中有王揆讀山翁（即木陳忞）大師新蒲綠，依韻柬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指示旁人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不難由此想見當時對他的景慕。但到順治十六年己亥，木陳忞應清帝之召入京，一時輿情頓失；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立中浮屠道忞北上一首中有謂「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之句。卷九董道權閑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中有「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之句；可見當時士大夫對他的失望。加以木陳忞由京南返，一路招搖；更於順治十八年出北遊錄，宣揚自己寵遇之隆。這中間他運用新朝權勢的背景，不斷和異己相鬪。到了康熙九年庚戌，他撰寶奎說及從周錄，正式向尚保有民族意識的僧徒和遺民開火。到了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才以七十九歲的高齡死去。（以上材料皆取自陳垣清初僧諍記）此時石濤正是四十五歲。石濤的本師善果月，據五灯全書六十六，寧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禪師條，及同書卷七十三，燕京善果旅庵本月禪師條，善果月隨木陳忞應順治之召，與木陳忞結冬於萬善殿。木陳忞還山時，留善果月及曉哲留京，善果月奉敕在善果寺開堂。後歷住奉聖龍池諸刹，晚退隱松江之九峯，卒於康熙丙辰，時石濤四十七歲。石濤之歸善果月，當在善果月退隱松江九峯的時候，因為北上別金陵諸友詩中有「江泖峯高映靈鷲，中有至人證道要」之句，正指的是善果月退隱九峯的情形。三泖即今之泖湖，在松江縣之西。三泖峯應即是九峯。此時石濤當在三十五歲前後，他還有晉謁木陳忞的機會。石濤雖出家甚早，但僧人常以參謁有所契合者為本師。石濤僧籍的祖與父，都是變節的政治和尚，但又皆文采卓著，傾動流俗。石濤兩次謁見康熙及北遊，我判斷是受了他這兩位聲勢煊赫的祖僧及父僧的影響。

所以當他六十歲的春天，第二次謁見了康熙，旋即將離揚州北上時別金陵諸友詩中謂「眷言有嘉招，袂聳訪名秀。浮雲去何心，滄波任相就。五湖鷗近關情親，三泖峯高映靈鷲。中有至人證道要（原注：先老人旅庵），帝廷來歸依巖竇。三戰神機上法堂，幾遭毒手歸鞭驟。謂余八極遊方寬，局促一卷隘還陋。……」石濤在此詩中，盛稱他與善果月（旅庵）之際遇。可見他年來心跡與善果月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而上引詩的後面兩句，分明追述善果月勸他不必以遺民心理局限了自己的發展，而應騁遊八極，蓋亦木陳忞從周之意。石濤得以兩謁康熙，並北遊京師，和博爾都的交誼有不可分的關係。石濤究以何因緣而能結識博爾都？合理的解釋，這是出於善果月的推介。因為他曾奉敕開法於京師之善果寺，與滿清皇室有一段甚深因緣之故。鄭板橋離官後一直住在揚州，曾慨嘆於八大山人畫聲赫赫，却很少人提到石濤。認這是因為石濤的別號太多之故。但石濤當時往還於金陵揚州之間，其聲氣之廣，遠非八大山人可及。而在乾隆年間，維揚一帶，已經少人提及；這和其僧祖木陳忞北上南歸後，聲名頓減的情形，完全是一樣的。並非因為他款識的別號太多，以致引起混淆的原故。

註：據陳垣清初僧諱記卷三：平陽御書樓諱項謂湖州報恩寺玉林通秀禪師，順治庚子奉詔入都，強而後行。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還山後未一經展視。故鹽官范驪頌之以詩有「還山不起御書樓」之句。天童木陳忞禪師於己亥奉詔入都，還山後在天童寺及平陽寺皆建奎煥樓，寶藏御賜手書。更著寶奎說，攻擊玉林對清帝之清高自許；事同傾陷。

五、石濤棄僧入道的原因(二)——另一僧系所給與石濤的衝激及轉變

現在再從另一方面來探索此一問題。

邵傳中既敘述了他由「北蘭澹公」之介而和八大山人見了面；可知八大山人和澹公是有密切地關係。八大裝啞的目的，是爲了不與世相接；所以他和澹公的友誼，決非尋常之事。傳中又謂「澹公杭人，爲靈巖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在傳贊中謂「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按皆宋遺民）輩，又當相扶携慟哭至失聲；媿予非其人也。」可知八大山人的裝瘋裝啞，始終是深抱遺民之痛的人。然則八大與澹公的關係究竟建立在什麼精神紐帶之上呢？

邵傳中所說的「澹公」，據雍正十年修南昌府志卷十四北蘭寺條下：「北蘭寺，在德勝門外，南嶽讓禪師道場，後廢。國朝康熙十六年，有臨濟派下僧淡雪，由浙江來重建……」。則邵傳中的澹公，必爲此人無疑。石濤四十一歲在宣城時，他似乎訪問過石濤。惜其行跡無法作進一步的考查。

澹公的本師靈巖繼公，五灯全書卷六十九稱爲「蘇州靈巖退翁弘儲禪帝」，他是漢月法藏（例稱漢月藏）門下的主要弟子。漢月藏原係曹洞；後來投到天童密雲圓悟門下，而成爲首座，與木陳忞同門；所以靈巖繼與木陳忞在僧門是叔侄關係。據南雷文案六有三峯（即漢月藏）塔銘謂「密雲悟公（即天童密雲圓悟）……開法金粟，師（漢月藏）徘徊而就之；雲（密雲悟）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真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於師（漢月藏），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讒構間作，於是有關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讒構漢月藏與密雲圓悟關係最力者即木陳忞。漢月藏卒於崇禎乙亥。靈巖繼爲漢月藏門中龍象，在緇素中，尤其是在遺民中有極高的聲望。木陳忞爲了向緇素中爭勢力，

遂集其矢於靈巖繼。在木陳忞未被召入京以前，猶稍爲隱忍。及奉召入京南旋以後，挾其新朝之勢力，對靈巖繼的攻擊，無所不用其極。因靈巖繼住金粟時糊扁一事，木陳忞遂借此作反正錄、杜逆說，並致書聲討。聲討書中特攻擊靈巖繼所出之樹泉集。由此可知與八大山人接近之澹公一系，與石濤僧祖僧父，乃當時仇怨極深之一系。

木陳忞未被召以前之仇視漢月藏一派，係爭宗門勢力。被召以後，則係以漢奸自慚自棄的心理，專與正人君子爲仇。以忠義著稱，並曾陰圖恢復的徐昭法(枋)，在其居易堂集十書先文清公(徐沂，明亡，死事甚烈)墨刻後中有謂「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朝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景，舉目山河者，又多股麥周禾之稱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又居易堂集十七，懷舊篇長句一千七百字中有云「天上靈巖一退翁，蔚然忠孝開宗風。瀾空慈雲覆世界，亘古正氣蟠心胸。」自注：靈巖繼起和尚繼起卒於康熙十一年，昭法爲哀詞略謂「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禱按指崇禎殉國之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於國，孝於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莖生全天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居易堂集十九)(以上皆取材於陳垣清初僧諍記卷二)超永著五灯全書，是經進呈朝廷，由康熙賜以序文的。卷六十九，叙靈巖繼起於康熙壬子(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將告終書囑語後：「有椿緊要話須補說。道貴真實。我生於明萬曆乙巳二月八日日出時，歷六十七年矣。記取葛藤椿子例日，切忌枯木上糝花。……不得更求名筆，虛飾生平，增我罪累。不許做七修齋，入於俗尚。亦不得請名宿或法子封龕舉火，作諸無益事。」在上述臨終的遺囑中，豈不隱含有身屬大明，永抱亡國之痛的意思在裡面嗎？由此不難想見靈巖繼一枝，實當時僧徒中民族精魂之所寄，殆爲當時縉素所默認之事實。由此不難推測八大山人與澹公的交遊，是建立在民族精神紐帶之上。

石濤出家後棲止廬山棲賢寺，與八大山人出家的奉新山中，甚爲接近，當然與八大山人曾聲氣相結。加以同是明代宗室之後，更會以節義相期許。木陳忞這一系的情形，八大山人通過澹公禪師，也當然會十分清楚。石濤到金陵後投到這一系裡，浸假而謁康熙，並北上京師，可謂失其故步，此必爲八大山人所深痛。其所以屢次寫信給石濤，必然是有所規勸。石濤一時不能擺脫木陳忞系的影響以斷然捨去，則對八大的規勸，自亦無辭可答。石濤在書札中謂「屢接先生手教，皆未奉答，總因病苦，拙於酬應，不獨於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濟此病，是笑話人。」八大非講酬應之人；病苦乃尋常之事，亦不致爲「笑話人」。所以石濤的病苦，指的是年來沾上新朝政治氣息的病苦；八大所加在他身上的規勸，會不斷地在他心中引起衝激。六十四歲由北京返維揚，對現實政治中心，經過一番親身體察，引起石濤人世蜉蝣之感(南歸賦別金臺諸公詩中有「其亦等蜉蝣」之句)，遊人倦矣之嘆(返揚州寄梅瞿山詩中有「倦矣懷商老」之句)，在這種時候，便促成石濤在生活上作了一個大決斷，拋棄僧服，以割斷與政治和尚木陳忞這系的葛藤；改充道士，以保全故國的冠髮；取堂名爲大滌，以表示一滌舊染之污。書札中「向上一齊滌」，這是向八大山人表示自己決心的隱語。石濤向八大求畫大滌草堂圖，其意豈在求畫，而是在對八大山人屢次手教所作的正式答覆。但這種內心的痛苦與轉變，不是可以向一般人解說的，也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一般人把他這種行爲依然認爲只是他的喜奇好異的一種生活形態。只有姜實節才了解石濤的「白髮黃冠」，乃是隱藏着「淚欲枯」的悲痛在裡面。石濤晚年的畫款中有的將「苦瓜」與「若極」(他的本名)合在一

起而稱爲「苦極」，豈無深意。這要算是他生命經過了一大曲折後所得到的一大昇華與解放。他晚年畫筆的浩瀚縱恣，實以此一生命的大昇華大解放爲基底，不能僅從筆墨技巧上去加以解釋。

六、與鑑別石濤畫蹟真偽的關係

解決了上述問題以後，對鑑別石濤畫蹟真偽問題，也有一個很大地幫助。對畫的真偽鑑別的方法，從來注重四個因素：一是畫法。但這是很直接的又極沒有把握的一種方法。二是研究所用的畫材。對畫材的鑑定，因科學工具的應用而可更爲精密。但對同時或時代略相先後的小家假冒大家名家的畫，便沒有辦法。並且唐絹宋絹、唐紙宋紙，也可以遺留到很久的時間。三是印章。清中葉以後，對此特爲重視，所以王季銓，和德人孔達，特以三年之力，編成明清畫家印鑑；而吳湖帆在序文中謂「且世風日下，作僞日滋；惟於印章，模仿縱工，細勘必有毫謬。」意思是從印章上鑑別最爲可靠。每一畫家假定只有一方兩方印章，則吳氏的話尙有其意義。而明清以來，一人常多至數十百方；既不能爲鑑定者所盡見，見之亦無由定其真僞；結果，常須由畫之真，以定印之真。但不僅不能由此一真印以律爾餘之印；且作僞者又有以真印印於僞畫上的方法；因爲印章可以流傳散出的。所以「對印章」是極不可靠的方法。四是由欸識上的書法，作鑑別的標準；據較有經驗的人講，僞畫法易，僞書法難，這在四種中是最可靠的方法。不過在實際上也非易事。總之，上述四種方法，應當互相參用，未可全信，亦未可偏廢。我對上述四種方法的應用，都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但我可提出另外一種文字考證上的鑑別方法，以補上述四種之不足。並且這種方法如應用得精密，其所得的結論，即會明確不移，無可爭論。作僞者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之點，即是他們只注意到畫面欸識上的描摹；而對原作者的生平及其背景的具體情形，常非常疏略。骨董商和大小名士及官僚大估們，也都疏於考證，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常與作僞者不相上下，甚至還趕不上作僞者，所以在這一點上也最易受欺。故宮博物院編印的故宮名畫三百種中的說明，出了許多笑話，一面固然由於今日在臺灣只有官僚，並無名士。同時也是因爲傳統上吃了缺乏文字考證基礎的大虧。我在香港看到一本近年編集得最詳備的鄭板橋集，前面影印了鄭氏幾幅字蹟和畫蹟；畫蹟是取材於揚州博物館。字蹟中鄭燮的「燮」字，有一件是「燮」字，有一件或兩件是用「燮」字。而畫蹟的欸識，則全是「燮」字。姑不論「燮」字乃後起的俗字，鄭板橋是進士出身，在署名時不致用此種俗字。最無法解釋的是，用「燮」字時。下面印章的篆文却一律是「燮」字。因此可以推論，凡欸識用「燮」字的不一定都是真的；但凡用「燮」字則必然是假的。這是把文字考證應用在鑑別上的一個小例子。

將文字考證用到石濤畫蹟鑑別上面的時候，首先要知道「大滌堂」，「大滌子」的名稱，在他是六十四、六十五歲之間才開始出現的。像汪研山清湘老人題記中的「丁酉秋八月爲希老年道兄畫菓品併題，清湘老人大滌子極」，必然是假；因爲順治十四年丁酉，石濤才二十八歲。又如程霖生石濤題畫錄大幅墨筆人物山水精品欸云「壬寅春仲造天龍古院作此以擬古人精華，識者賞之。大滌子石濤濟山僧」，也必然是假；因爲康熙元年壬寅，石濤是三十三歲。又如程霖生石濤題畫錄松瀑鳴琴人物山水堂幅巨製欸云「清湘陳人大滌子，時丙辰口口。」必然是假；因爲康熙十五年丙辰，石濤是四十七歲。如此可以類推下去，百無一失。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石濤棄僧爲道，是在六十四歲與六十五歲之間；大滌堂大滌子的名

稱，也是從此時開始。縱然他過去的名號，如「石濤」、「清湘」、「原濟」、「道濟」等，不會因此全廢。但直接連上「僧」字「和尚」字樣的，自六十五歲以後，在情理上不應當再用。若在他六十五歲以後的畫款上，仍有「苦瓜和尚」、「濟山僧」、「小乘客」這種稱呼，及印上「善果月之子，天童恣之孫，原濟之章」的印章，有理由斷定必是假的。在六十五歲以後，他人不明瞭他已經棄僧爲道，或知之而以爲這不過是一種遊戲性的行爲，因而還稱他爲「上人」、「和尚」，那是在情理之中。但在他自己，則是在情理之外。尤其是永原氏所藏的大滌草堂圖，有石濤自己題的詩，但署款則是「時戊寅夏五月清湘陳人大滌子濟山僧艸」，在他的精神上由此圖而正面對着八大山人，却將「濟山僧」和「大滌子」寫在一起，是無法說得通的。要有，只有前面已經指出過，在石濤三十三歲時「壬寅春仲造天龍古院……大滌子石濤濟山僧」的一張畫，是與此相同，而那當然是假的。所以我認爲這張大滌草堂圖不是出自八大山人之手。豈有在求畫書札上寫下「莫書和尚」；把畫求到後，却又自己題上「濟山僧」之理。從全般情況衡量，甚至八大山人不曾交代過這幅畫，因爲目的本不是在求畫的。凡是題上「濟山僧」這類的畫，都應當是從四十左右到六十三四左右的畫。本著我上述由文字考證所得的標準，將今日流行的石濤畫跡作一全面檢證，雖然不能說合於這一標準的都是真，但不合於這一標準的必然是假，使作僞者原形立露，束手就擒，當係一大快事。

拿著文字考證的立場來說，則張岳軍先生所藏（以後簡稱「張本」），經張大千先生題爲「天下第一大滌子」的石濤通景屏風十二幅，只是一位高手從贗品中摹出的，而決非石濤真蹟。因爲在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一題畫山水中收有如下的一跋：

「石文自清潤，層繡古苔錢。今「令」字因失校而誤。人心目朗，招得米公顛。余顛顛未已，豈讓米公前。每畫圖一幅，忘坐亦忘眠。」款題「癸酉冬月此字疑因失校而衍。初畫於邗上之大樹堂，清湘老人濟。」

在卷三梅蘭竹石松菊芭蕉芙蓉通景下，全錄了上款；除「令」字未錯，「月」字未衍外，在「忘坐亦忘眠」句後，多出下面八句：

「更不使人知，卓破古青天。誰能袖得去，墨幻真奇焉。菊竹若青張本作「清」字，志是，此失校。與爾可同年。真顛爲張本作「謂」字。誰老？苦瓜製此篇。」

在此八句後之款識與前款全同。後面更有「予猷看竹情依石」的詠竹與菊的一絕；有「竹子曉烟籠冷翠」的詠竹二句，款爲「風雨中坐澹可齋復展此紙偶書」。又有「芭蕉葉，蘭花雪，風韻高閑天地別」的詠芭蕉與蘭花共十二句，款爲「清湘老人甲戌復題」。再有「谿深石黑前峯影，樹老婆娑倒掛枝」的詠石松二句。最後又有一較長款識：

「予性懶真，少與世合。惟筆與墨，以寄閑情。古德云，何妨筆墨資真性，此之謂也。」

「姬老年道翁，知交有年，人品高潔，心志澹然：故以筆墨而假遊詠，以見余方外之所到。隨作一詩，俾松蘭石竹各得風韻，惟大君子視之筆墨之外張本無「外」字。「可耳。若以工拙較之，寧無愧色。湘源苦瓜並識。」

張本的題識除「真顛爲誰老」之「爲」作「謂」字；及「筆墨之外」句少一「外」字以外，與上抄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三所錄者全同。

這裡我首先提出研究的是：石濤曾在一幅畫上題下了款識（如前所錄卷一的），但在另一幅畫上，又用上原款識，而僅在後面加上八句（如上所錄卷三的），這種事情是可能出現的

嗎？卷一所題的款識，主要是詠所畫的石頭，因而此畫必是以石頭為主。卷三所錄的後尾增加的八句，前四句還是詠所畫的石頭；只有「菊竹若清志」一句，才點出了菊竹。張本的內容，正如標題一樣，是由「梅蘭竹石松菊芭蕉芙蓉」八樣東西所構成。石濤爲什麼要把本是以石頭爲主的題識，却在另一幅並非以石頭爲主的畫上（如張本）重抄一遍？難道說石濤的江郎才盡，一至於此嗎？張本中間的六個題識，乃是對畫面各部份的分題，並以不同的字體寫出，這是小家數賣玩聰明的玩意，大家如石濤，恐不出此。石濤若要分題，自會一次一氣題下；但觀其中「復展」、「復題」的字樣，却非一次題就的，這又是爲了什麼？古人也有畫成一幅得意的畫，而一題再題三題的情形；但決非「分題」的性質。尤其是最後的題識、文字有的不通順，而氣象又非常寒儉，與石濤文字的樸厚豪逸氣象，可以說是天壤懸隔的。因此，張本的原本，十之八九是一件贗品。

但我爲什麼說張本又是從贗品中摹出的呢？因爲在第一款中，張本作「真顛謂誰老」，當然不及卷一所錄的「真顛爲誰老」通順；若本來是「謂」字，錄寫的人怎麼可以擅改成「爲」字？而最後一款中，張本少一「外」字，使全句不通；石濤既未自己注補，錄寫的人也未加注明，而即代爲加上一個「外」字，這也是不可能的。這兩個字的差池，全出於摹寫者一時的疏忽。摹寫者因爲不能知道他所根據的原是贗品，便費了很大的工夫摹寫下來，却依然露此馬脚。張本筆墨清潤，與石濤中年畫風頗合，所以它的真偽，只有從文字考證上着手才能看出來。

因我沒有時間對八大山人作專題研究，這裡只好順便對八大的畫蹟，提出點滴性的意見。我在本文中，根據邵傳以推論八大的生年，並推論他棄毀僧服，改名八大山人時，當在四十歲以後，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八大山人」是他毀棄僧服以後的名稱。因此在他四十歲以前的畫蹟，不應當有八大山人的題款。此外，大風堂名蹟第二集八大山人專輯十九「撫董思翁古冊」中，「臨倪迂」一幅的旁邊，張大千先生寫了下面幾句話：

「山人畫法，從董思翁（即董其昌）上窺倪黃。三百年來，無論藏家畫家，無一人於此著眼者。此一瓣香，始自老夫拈出。今又得此冊，益信鑑賞不謬。」

按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上，首出「八大山人」。在小傳後所附的贊語是：「白苧村桑者曰，隆科寶記云『山人畫得董華亭（即董思翁）筆意』，非是……。」觀此，可知八大山人的畫，係由董思翁出，並非始自大千先生拈出；而八大山人筆意蒼勁渾樸，與董思翁之秀潤雅淡者未必同科，故不免爲張庚所呵。大千先生在這種地方，特亦故作英雄欺人之語而已。

附影印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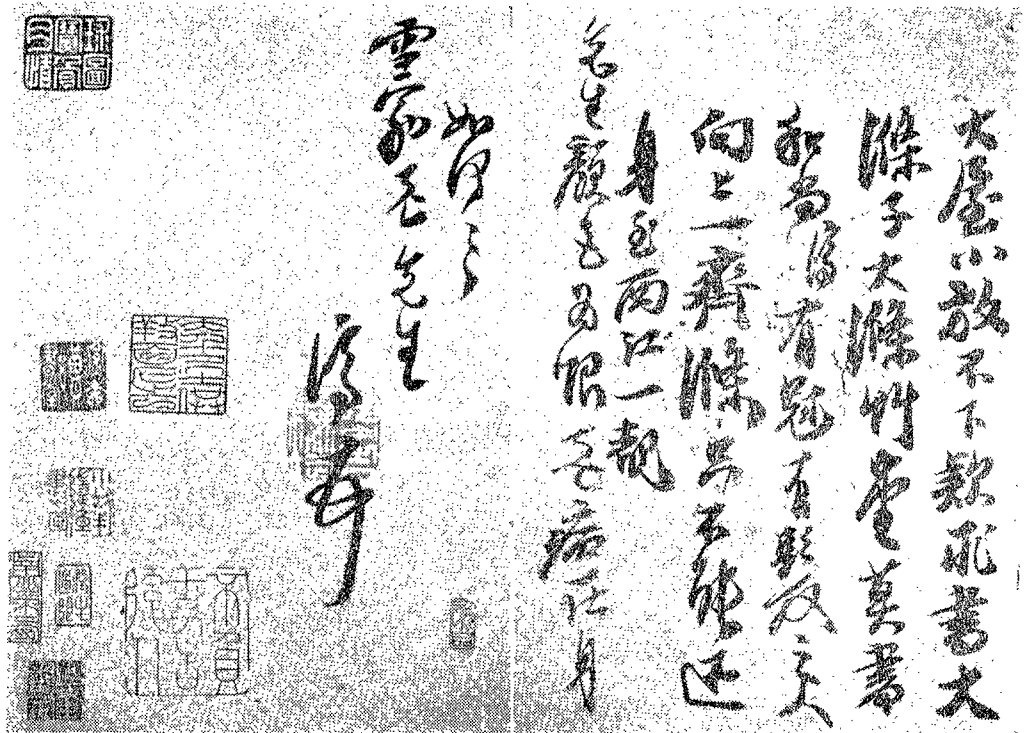
其後
 先生之說皆未盡言
 德曰病苦拙者翻亦不弱
 於
 先生之有四方者知法
 苦處是嘆服之用
 先生年逾七十而登此老
 其神仙中人乃不亦奇
 活者不絕十年之素見在
 未嘗新得者且謂非信
 可能證類乃是靈物也
 八日 李松庵之逸園

州京函寄上結欲凡
 先生之為國一軸平收
 巨屋數枚故古未移數
 數條圖中曾語存不亦
 大條書如法屬多不亦者
 餘紙亦在書數一集
 付寶物也款求寫大條
 且大條此卷莫宜也為得
 有冠有髮之人而一齊歸
 只不能還多至江一暗
 先生顏甚為恨之病在身如
 不空工
 雲和先生

附影印片二

聞
 先生花甲七十四年終山如飛
 直神中人 將亦
 諸事不堪十年已
 未見能事者新得者
 且皆以 筆可能讚
 頌得之實人物也
 日幾次接
 先生手教皆未及奉
 養總因病苦拙於酬
 應不暇耳
 先生一人荷四方皆知

是年等病真甚矣
 人今日李在庵名還
 兩州名畫也
 王侯將相
 先生三天為一天開少幅
 平坡上老舍齋樣在
 本博教教孫閣中
 一志與名諸所有即
 大勝子大勝堂中此事
 少不誤者餘紙此
 信書教到不三其
 信實物之內所樂有



SOME PROBLEMS ON SHIH TAO'S CONVERSION
FROM BUDDHISM TO TAOISM

Hsu Fu-Kuan

Why did Shih Tao (石濤) go twice to see Emperor Kang Hsi (康熙)? Originally a Buddhist monk, why did he later become a Taoist priest? These two questions, essent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hih Tao, have been disregarded by all previous scholars. Basing the three letters by Shih Tao asking the famous painter Pa Ta Shan Jen (八大山人) to paint Ta Ti Cottage (大滌草堂圖), the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resolve these questions. Also, using the study of Shih Tao's paintings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carefully examining a painting inscription in order to verify its authenticity. The problem of the date of Pa Ta Shan Jen's birth is also treated.

石濤晚年棄僧入道的若干問題

徐復觀

石濤何以兩次謁見康熙？晚年何以棄僧入道？此兩問題對石濤之了解，甚為重要，但自來為研究者所未及。本文因就石濤致書八大山人求畫大滌草堂圖的三通書札研判其真偽，因而對上述兩問題，有詳盡的闡述。更以石濤畫之真偽鑑別為例，提出「文字考證」在鑑別上之重要性，並附及於八大山人之生年問題，亦有所考定。